



第六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8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
2008 年审查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
执行情况

《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发展筹资宣言》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根据大会第 67/199 号决议的要求，本报告对《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发展筹资宣言》的执行情况进行年度评估。报告分以下六个专题领域介绍执行情况：调集国内金融资源促进发展；调集国际资源促进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私人资本流动；以国际贸易带动发展；加强国际金融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外债；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连贯一致促进发展。题为“继续努力”一节阐述了有关加强发展筹资政府间后续进程的最新情况。

* A/68/150。

** 本报告与参加发展筹资进程的各主要机构利益攸关方工作人员协商编写。但由联合国秘书处对报告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一. 调集国内金融资源促进发展

1. 《蒙特雷共识》和《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强调指出，调集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国内储蓄是实现增长的共同目标，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均属至关重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中，重申必须调集国内资源，满足可持续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尽管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估计数肯定不够精确，研究报告得出结论是，这一需求总是很大。不过，资金需求估计数在全球储蓄和资产中仍然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截至 2012 年，全球每年储蓄额约为 170 000 亿美元左右。¹ 同时，截至 2011 年，全球金融资产已经达到 2 180 000 亿美元左右。² 尽管重新分配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将具有切实挑战性，但将这一投资中很小的百分比，比如说 3-5%，重新用于可持续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

3. 2011 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储蓄为 32%，而高收入国家则为 18%，³ 这意味着储蓄的大头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近一项研究⁴ 中所作预测，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全球资本存量将有一半是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金砖国家，而今天这里的资本存量尚不到三分之一。这突出表明必须改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效力，以促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长期投资。

4. 《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发展筹资宣言》确认，需要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部门，并强调必须鼓励国内资本市场的有秩序的发展。事实上，从 2000 年到 2013 年，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低收入国家从平均 19% 增加到 33%，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从 52% 增加到 82%。⁵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商业银行仍然是贷款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私人债券市场则不够发达或根本不存在。例如，虽然私人债券在高收入国家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他们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比例仅为 9%，而在低收入国家则接近零。⁶

5. 具有深度的资本市场应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长期投资渠道。然而，所存在的风险是，这种新生市场将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导致短期泡沫，并可能随着全球投资者的情绪变化发生扭转，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因此，重要的是，各国与资本账户管理部门相配合，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2012 年世界经济展望》(2012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² TheCityUK，“2012 年基金管理”。可查阅 thecityuk.com。

³ 按照储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量，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13 年。

⁴ 世界银行，《用于未来的资本——相互依存世界中的储蓄和投资》，(2013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⁵ 世界银行，2013 年《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13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⁶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2013 年 4 月。

6. 国内机构投资群体(包括诸如家庭养恤基金、保险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可以提供更稳定的投资来源。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仍然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但有一些突出的例外,例如南非⁷和智利,这些国家的养恤金资产数额很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60%,虽然这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0%到100%以上。⁶

7.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机构投资者群需要更新专门知识和技能,以及改革许可证制度、投资组合的要求和证券法的改变。⁸此外,虽然投资项目都要求长期筹资,即使发达经济体的机构投资者,也不一定具有长期投资的视野。特别是,养恤基金投资于长期基础设施资产的数额只占其总体投资不到1%。⁹因此,制定机构投资群体的政策措施时应考虑采取奖励措施,推动更长期投资。

8. 金融部门的深化常常与更强有力的经济业绩联系在一起;¹⁰不过就此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初步研究¹¹表明,较大金融体系在容量小的金融市场意味着生产力的更大增长,而在较发达金融市场,其中关系却不够明确。特别是,随着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深化,金融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会加大。¹²一项可能的原因是,信贷额的增长未必会转向生产性投资,这涉及到金融市场日益显现的短期性。

9. 金融部门的深化还常常包括金融方面更大的包容性。在全球范围内,到2012年有25亿成年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至少在一家正规金融机构有一个账户的成年人比例在高收入国家大约为90%,但在中上收入国家大约仅为57%,在中低收入国家为28%、在低收入国家为24%。¹³此外,有人提出,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大约有2亿中小型企业缺乏充足的资金。¹⁴为解决金融渠道问题,

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The role of banks, equity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long-term financing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for G20 leaders”, 可查阅 oecd.org/finance/lti。

⁸ Andrew Sheng,“Outlook for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 Excess or Shortage?”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报告的背景文件,2013年5月。可查阅 post2015hlp.org/the-report。

⁹ G.Inderst,“Pension Fund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保险和私人养老金的工作文件,第32号(2009年,巴黎)。可查阅 OECD-ilibrary.org。

¹⁰ R. Levine,“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ghion and Durlauf, eds.(Amsterdam, North-Holland Elsevier, 2005年)。

¹¹ Stephen Cecchetti and Enisse Kharroubi,“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s, No. 381(Basel, Switzerland, 2012); Cotarelli and Jaramillio,“Walking hand in hand: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 基金组织工作文件(2012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¹² Martin Chihak, 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205 economies, 1960 to 2010”, 国家经济研究局第18946号工作文件(2013年,马萨诸塞州剑桥)。

¹³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普惠数据库。

¹⁴ 《秘书长包容性发展筹资特别代言人,2010年年度报告》。

金融普惠性应成为金融部门总体政策和监管框架的一项目标，并辅之以联邦、各省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政治承诺。

10. 此外，良好治理和有利环境对于有效调动国内财政资源和建立一个包容性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虽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法律和监管改革、改进信息提供、促进经营便利程度方面取得进展。例如，自 2005 年以来，启动一项生意的平均时间已经从 50 天减少到 30 天，在低收入国家这一平均天数则下降了一半。¹⁵

11. 最终，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带动国内资源的调集，从而突出了有效国内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在政策中将经济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同时应调动资源并更有效使用公共支出，以确保提供基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蒙特雷共识”强调了提高公共资源的必要性。

12. 然而在提高公共收入的能力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距。2008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4.5%，¹⁶ 低收入国家则为 17%，不过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例到 2010 年下降至 33.8%¹⁷（目前尚没有低收入国家的数据）。¹⁶ 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税务系统采用的是多元化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采用一系列税收数字为基础在经济上是成立的，因为收集任何类型税收的边际成本在达到一定的阈值后，尤其是在税务部门较弱的情况下，会不成比例的增加。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往往依赖于狭窄的税款，尽管这些都取决于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从采掘业获取其税收，而内陆国家一般在其境内通过贸易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收取大量税收收入。¹⁸

13. 世纪之交以来，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中位数在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在 2000-2009 年期间，增值税税收在低收入国家增加到占国内总产值的 4%，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则在 6%至 7%之间。1980 年到 2009 年期间，最大幅度增长是在中上收入国家，增值税收入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增加一倍以上。在同一时期，贸易税大幅下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降至国内总产值的 2%左右，大约相当于 20 世纪 80 年代水平的一半。¹⁷ 虽然增值税对许多国家来说，已实际成为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增值税收入不一定能够弥补贸易税的下降，许

¹⁵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13 年“营商环境”报告，（2013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¹⁶ 经合组织，“税务统计 2012 版”（巴黎，2013 年）。选定表格和统计数据可查阅 oecd.org/tax/tax-policy/revenuestatistics2012edition.htm。

¹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venue Mobi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1”。可查阅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30811.pdf。

¹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协助建立更有效的税收制度”，20 国集团发展问题工作组的报告，2011 年。可查阅 oecd.org/ctp/48993634.pdf。

多最不发达国家的总体收入最终下降。¹⁹ 这一短缺可能是由于行政管理和收集工作方面的困难所致。增值税为欺诈和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因为行政管理薄弱的国家会感到难于应对。²⁰ 此外，有人担心的是，由于对所有消费成比例的税收，增值税的分配影响相对于年收入就是递减性的，尽管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是好坏参半。

14. 整体所得税在 1980 年至 2009 年期间保持稳定，在低收入国家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 1.5%，在中低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则将近 3%。个人所得税款项在低收入国家也约占国内总产值的 1.5%，或小于全部税收的 10%。相比之下，在高收入国家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即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占全部税收的 24%²¹）。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不到 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几乎有 50% 的人口支付个人所得税。¹⁷ 发展中国家无法征收更多所得税的原因包括税收政策不力、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以及行政机构不能将税收范围扩大到自营职业者，再加上政治阻力。建立一项纳税的文化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避税行为和政治阻力。²²

15. 非法资金流动（即非法赚取、转让或使用的钱）都阻碍了许多国家调动国内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²³ 各种各样的非法资金流动，诸如逃税和避税行为、贸易不当定价和转让不当定价都不公平地剥夺了国家税收。举例来说，贸易不当定价是一种非法安排，即为避税目的提高进口账面价格和（或）降低出口账面价格。转让价格是指跨界集团内部交易的定价机制。这本身是跨国企业正常运作方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公司内部价格并不反映真实价值，实际利润有可能转移到低税收或无税收管辖区，而损失和扣减则转向高税收管辖区。有证据表明，大规模非法流动也无助于国内投资。²⁴

¹⁹ M.Keen and M.Mansour, “Revenue mobil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challenges from globalization I-trade reform”,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28, No.5(2010 年 9 月)。

²⁰ 请参阅例如，J. Zuleta, A. Leyton and E. Ivanovic,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the revenue administration: the case of VAT refunds in Bolivia”, in *The Many Faces of Corruption*, Campos and Pradhan, eds.(世界银行，2008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²¹ M. Keen,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WP/12/220)。(2012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²² O.H.Fjeldstad,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规划研究所第 2013/010 号工作文件(2013 年，赫尔辛基)。

²³ 基督教援助组织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仅因转让不当定价和伪造发票便损失 1 600 亿美元。Valpy FitzGerald 估计发展中国家在 2000 年代中期的损失每年为 2 000 亿到 2 500 亿美元，而 A. Cobham 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因逃税和避税所蒙受的税务损失总额为 3 850 亿美元。全球金融诚信作为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所作估计是发展中国家在 2010 年因资金非法流出所受损失为 8 590 亿美元。

²⁴ Mick Moore, “The practical political economic of illicit flows”, in *Draining Development? Controlling Flow of Illicit Fund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Reuter, ed.(世界银行，2012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6. 解决不当转让定价的最好办法是加强税务管理和制定及实施转让定价立法。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转让定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出于这一原因，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操作手册》。²⁵

17. 要最有效地打击逃税和避税作法，就要有经费充足的独立税务当局，而对付贸易不当定价则要靠正常运作的海关当局。对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为确保对多国公司经济活动的适当课税，特别是在合同谈判中，保持采掘业的透明度是一个关键。各国应进行合作，以确保对多国公司在为采掘业争取有利财政制度的压力下不会变成一场所谓“竞相杀价”。鉴于大多数非法资金流动具有跨界性质，有必要加强反洗钱措施，以及国家间的法律互助和信息交流。在最近一次 8 国集团会议上，与会各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应有信息和能力，收取其应得税款，而其他国家则有义务帮助他们。”²⁶ 20 国集团财政部长也表示了这一意愿，并重申他们关于扩大自动交换信息做法的承诺。

二. 调动国际发展资源：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私人资本流动

18. 《蒙特雷共识》强调了在国家国际发展努力中，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多哈宣言》重申了这一点，强调了国际私人投资对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并重申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19. 跨界私人资本流动由若干部分组成：外国直接投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中一个主要部分，并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外国资本的形式。其他流动包括证券和债务投资组合以及国际银行贷款。此外，利用短期资金流动的衍生产品，特别是当地外汇和货币市场，可以构成多种形式实物流动。²⁷

20. 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筹资需求日益扩大，国际投资者所作长期投资看来已经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减少了大约 18%，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²⁸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估计将下

²⁵ 可查阅 un.org/esa/ffd/documents/UN_Manual_TransferPricing.pdf。

²⁶ 关于《厄恩湖宣言》，可查阅 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07543/180613_LOUGH_ERNE-DECLARATION.pdf。

²⁷ 《2012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E.12.II.C.2）。

²⁸ 《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E.13.II.D.5）。

降 4%左右，从 2011 年的 4 370 亿美元降到 2012 年的 4 190 亿美元，²⁹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²⁸

21. 虽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体下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2 年增加了 20%。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入中仍然占有主要份额。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向非洲的资金流动虽比十年前更高，但仍然十分有限。资金流入仍然集中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最近，在最不发达国家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新生产能力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生产能力投资有 28%投入了基础设施。²⁸

22. 然而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在增加财政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却失去了更为稳定的新生产能力投资。³⁰ 例如，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似乎已从证券转到债务领域。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显现出的是，当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司内部债务时，母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这种债务撤回。因此，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包括了短期投资，这种投资在不确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发生的扭转可能比预期更快一些。

23. 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到 2012 年达到世界总额的 31%。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三，其中主要部分来自中国。³⁰ 然而，来自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在 2012 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其中主要是来自南非的资金。

24. 南南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发展投资范围有所扩大，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采用的技术和技能与本国公司的水平更为接近。一般而言，类似新兴经济体的技术更容易吸收，而本地公司可以更为有效地消化。

25. 在更广的意义上，外国直接投资与其他形式相比的优势之一在于其转让知识和技术的潜力。但是，实际经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知识外溢效应的作用好坏参半。³¹ 在有证据显示积极溢出效应的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这种积极效应很可能

²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3 年 4 月，以及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在所包括国家方面，不同于该部门的“发展中经济体”分类；因此，私人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额数字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所公布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

³⁰ Jonathan D. Ostry 等人，“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what tools to use”，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1/06)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 年)。

³¹ Xiolan Fu, Carlo Pietrobelli and Luc Soete, “The role of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atching up”,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Technical Notes, No.IDB-TN-166 “新兴经济体的国外技术和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技术变革和赶上”，美洲开发银行的技术说明，第 IDB-TN-166 号 (美洲开发银行，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 年)。

是因为政府推行的明确政策。³² 另一方面，在没有采取这种政策的其他国家，则没有明确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³³

26. 为加强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力，不妨考虑采取各项政策：鼓励企业与国内生产活动之间建立反向生产联系，加强技术转让并为当地劳动力创造培训机会。³⁴ 与此同时，决策者还应当解决包括管理投资风险在内的非财政领域障碍，努力建立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吸引长期、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

27. 由于长期投资所需资金数额较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机构投资者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它们在可持续发展筹资方面的投资受到限制，部分原因是管理结构薄弱和治理不善，以及整体市场的缺陷。此外，短期激励措施——特别是金融中介机构——措施的不匹配妨碍了长期投资并增加系统性风险。

28. 到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机构投资采取了推测性、注重短期证券的投资形式。此外，许多机构投资者在危机期间遇到了债务重新融集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进一步减少了长期投资的比例。³⁵

29. 最近的趋势显示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所增加。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在 2011 年下半年下跌，于 2012 年上半年增加，然后再次下跌。在 2013 年年中，因猜测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可能会放缓量化宽松政策，投资者大量赎回新兴市场的股票基金，大量资本进一步外流。³⁶ 这种波动性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较高社会成本。³⁷

30. 银行商业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仍然较小，因为若干国际银行——特别是在欧洲——继续面临去杠杆化的压力。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有证据表明，过去几年里，银行提供的长期融资受到约束。事实上，欧洲银行到期日在两年以上的

³² S. Mani,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2002 年)。另见 Rasmus Lema 和 Adrian Lema, “Whither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in green technology sector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ighth Globel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吉隆坡, 2010 年 11 月。

³³ K. P. Gallagher 和 M. Shafaeddin,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learning in China and Mexico”, 技术及社会, 第 32 卷, 第 2 期, 2010 年。

³⁴ 《201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伟大的绿色技术变革》(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号 E.11.II.C.1)。

³⁵ 《世界经济论坛》“未来的长期投资”, 可查阅 weforum.org/reports/future-long-term-investing-1。

³⁶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第 56 号每月通报》(2013 年 7 月)。

³⁷ J. A. Ocampo and J. Stiglitz, eds.,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纽约)。

国际支付请求数一直在下降，其中包括所有跨界和地方外币的支付请求，有证据表明，投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借贷已转向更短借期。³⁸

31. 《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宣言》还强调了侨汇款对发展的重要性。³⁹ 根据正式记录所作估计，2012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侨汇总额为4 010亿美元，远远超过官方发展援助。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墨西哥依然是最大的移徙者汇款接收国，但侨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最高的则是塔吉克斯坦、利比里亚、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等较小的发展中国家。⁴⁰ 侨汇在过去十年中的高速增长突出显示了侨民作为外汇收入关键来源的重要作用。虽然侨汇对国内消费和减少贫穷都产生重大影响，但到目前为止，侨汇并未成为一种促进发展的长期投资。有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已采取举措，鼓励将侨汇款收入用于投资目的。而且汇出国和汇入国必须开展合作，降低汇款成本，并在可能时减少移民汇款和其他资金流动的法律和收取障碍。

三. 借助国际贸易推动发展

32.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的复苏在2012年失去势头。世界贸易仅增长2.0%，比2011年的5.2%有所下降，预计贸易增长仍将缓慢，在2013年为3.3%。⁴¹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一减速与需求不振有关。在欧洲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口需求急剧收缩，在日本和美国则减缓。⁴²

33. 在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商品贸易增长速度为3.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因而日益感到全球贸易减缓的影响。特别是东亚国家，在2012年大部分时间，其出口下降，而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初级商品出口国则在2012年下半年经历了出口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所占份额略有下降，其份额仍然很低，仅为1.1%。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产品上仍然高度集中。此外，五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占总额的62%。⁴³

³⁸ 世界银行等，“增长与发展所需的长期投资融资：总括性文件”，提交给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2013年2月。

³⁹ 侨汇与其他类型的资金流动有些不同，因为侨汇列入经常账户，而不是资本账户。

⁴⁰ 世界银行，“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0”，2013年4月19日。可查阅 worldbank.org。

⁴¹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2013年4月10日新闻稿“2012年世界贸易，2013年展望”。可查阅 wto.org/english/news_e/pres13_e/pr688_e.htm。

⁴² 《2013年世界经济局势和展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3.II.C.2)。

⁴³ 即安哥拉、孟加拉国、赤道几内亚、苏丹和也门。见201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利用侨汇和散居国外者的知识建设生产能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II.D.18)。

34. 尽管属于二十国集团的国家承诺抵制保护主义，但 2008 年 10 月施行的许多贸易限制仍然存在，到目前为止只废除了 19%。⁴⁴ 不过，新施行的措施继续减少。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结束将会有助于阻止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将大大有助于取得更快的全球经济复苏和更公平和包容的增长。但是 2011 年 12 月已正式宣布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眼下看来一项全面协定仍然遥不可及。⁴⁵ 将在 2013 年 12 月举行的第九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是打破这一僵局的机会，并可在三个领域达成交易：贸易便利化、农业谈判和发展。

35. 关于贸易便利化，谈判者在争取达成一项协议，以加快货物的流动、发放和清关，澄清和改进商定的规则和管制，并提供有效的海关合作。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执行情况与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能力建设相关连。在农业方面，正在讨论的事项包括一项关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公众参与食品保障的提案，关税配额管理以及逐步取消高度扭曲贸易的出口补贴。但对农业讨论的核心问题在目前阶段尚无任何共识。

36. 在第九次部长级会议上就发展问题取得的进展可包括建立一个机制，以监测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施行情况，以及专为最不发达国家制定的一整套措施。关于后一问题的提案涉及四个领域：全面执行关于予以最不发达国家产品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以及予以最不发达国家服务出口优惠准入的香港会议部长级宣言，并达成一项棉花协定。已经商定将最不发达国家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过渡期延长至 2021 年 7 月 1 日。⁴⁶

37. 在多边贸易体系无法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同时，双边、区域和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继续迅速增加。目前，已有 251 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投入运作，更多的协定正在谈判中。⁴⁷ 由于此类协定允许成员国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因而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贸易规则，并破坏多边体系的一致性。协定中的规定往往超越世贸组织的范围，并有可能将最不发达国家更加挤到全球经济的边缘，因为自由贸易协定很少包括这类国家。

38. 贸易援助是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类别，其作用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应对贸易方面的困难，加强其贸易能力；随着官方发展援助在 2011 年的整体下滑，此类援助大幅下降。承诺数降至 415 亿美元，比 2010 年降低 14%，

⁴⁴ 世贸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若干关于 20 国集团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报告：2012 年 10 月中旬至 2013 年 5 月中旬。可查阅 www.unctad.org。

⁴⁵ 世贸组织：2011 年 12 月 17 日主席的结论声明(WT/MIN(11)/11)。

⁴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延长最不发达国家的第 66.1 条规定的过渡期，2013 年 6 月 11 日(IP/C/64)。

⁴⁷ 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2013 年 5 月。

预计将在 2012 年进一步下降。⁴⁸ 2013 年 7 月，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进行了第四次全球贸易援助审查，其重点是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相接的战略。

39. 今天，全球贸易总额中，约有 80% 属于企业内部或企业间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增值贸易的占比大幅增加，从 1990 年的 20% 上升到今天的逾 40%。⁴⁹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占全球贸易总份额的增加。然而，更多的参与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的享有全部潜在惠益，发展中国家需要颁布国家政策并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以获益于技术的传播、技能培养和升级。此外，全球价值链中更密集的货物运输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仅商品贸易的运输就可能带来超过 7% 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⁴² 为了确保国际贸易、运输和环境政策的一致性，减少货物运输排放的措施必须辅之以更综合的办法，包括通过关于环境商品与服务的谈判取得进展。

40. 生产网络普遍及全球也意味着需要更好地综合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以及有关外国附属公司、多国企业和业务职能外包、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收支的统计数据，以通过全球价值链准确衡量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统计委员会已在讨论一项新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计量框架。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也已开始编制新的增值贸易数据集。

四. 增进国际金融和技术合作以促进发展

41. 《蒙特雷共识》敦促发达国家作出切实努力，争取将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的 0.70% 用作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国产总值的 0.15 至 0.20% 用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申国际社会关于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承诺，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并呼吁发达国家到 2015 年时实现 0.70% 的承诺，以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0.15-0.20% 承诺。

42. 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在其 2012 年 12 月高级别会议上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在外资筹措和利用其他资金流动方面至关重要。委员会成员还重申其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并达成共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43. 尽管如此，在 2012 年，官方发展援助按实值计算连续第二年下降。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在 2012 年提供了 1 256 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 0.29%。这意味着在 2012 年按实际价值计算减少了 4%，自 2010 年以来，按实际

⁴⁸ 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 2013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即将出版)。

⁴⁹ 全球价值链和发展：世界经济的投资和增值贸易(联合国出版物，即将出版)。

价值计算共减少 6%；2010 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高峰。⁵⁰ 捐助者也未实现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从 2011 年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 0.11% 下降到 2012 年的 0.10%，只有 10 个委员会成员达标。最新数据还显示，对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减少了，这两类国家也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群体。⁴⁸

44. 此外，预计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在中期内会停滞不前。最近对捐助者未来支出计划的调查⁵¹ 显示，2013 年官方发展援助增加 9%，主要原因是少数几个主要捐助国计划增加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和多边机构软贷款的增加。但预计从 2014 年至 2016 年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会出现停滞，特别是对最贫穷、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差距最大的国家的这类援助。预计仅对远东和南亚和中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会增加。

45. 削减援助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捐助国在危机后采取了紧缩政策，削减最多的是受欧元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总体而言，15 个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付款减少。最大的捐助方——德国、法国、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都减少了其援助。这些负面的事态发展是从国际商定援助目标的明显后退。到目前为止，在 2013 年只有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继续超过联合国的目标，而联合王国预计会达标。

46. 在 2012 年，一些国家尽管预算情况困难，但还是维持或增加了官方发展援助预算。9 个国家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增加，记录显示增加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冰岛、卢森堡和大韩民国。一些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捐助方，包括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幅增加了援助。

47. 总体而言，正当世界致力于在 2015 年最后期限之前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力图制订一项以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大胆的 2015 年后发展战略之际，援助却在下降。虽然光靠官方发展援助不足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全部需要，但此种援助对没有足够资源来实现发展目标的国家仍然至关重要。官方发展援助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国家，特别如最不发达国家，外部筹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后者而言，它占其可用于弥补节余短缺的外部资金的一半左右。⁵² 此外，官方发展援助日益被视为一种促进私人发展筹资的手段。

⁵⁰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2013 年 4 月 3 日新闻稿：“各国政府紧缩预算，对穷国援助进一步下滑”。可查阅 oecd.org/newsroom/aidtopoorcountrieslipsfurtherasgovernmentstightenbudgets.htm。

⁵¹ 经合组织“援助展望：2013-2016 年支出计划”，2013 年 4 月 3 日。可查阅 oecd.org/doc/aid-architecture。

⁵² 2012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48. 援助质量一直被认为是决定援助对发展产生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各国在 2005 年通过的《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中承诺提高援助实效。但执行《巴黎宣言》中关于更有效援助的各项原则的成绩记录却令人失望。在全球一级，在通过的 13 个目标中仅实现了 1 个，不过，在实现其余的许多目标、特别是责任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⁵³

49. 特别重要的是援助付款的稳定，包括对受援国的发展规划来说具有可预测性。事实上，《巴黎宣言》让捐助者承诺一个多年援助计划并按时按量支付。后续的 2008 年《阿克拉行动议程》的规定采取行动，更好地提供信息，以帮助做中期规划，包括三至五年的预期支出和执行计划。在大韩民国釜山举行第四次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之后，制订了一个全球监测框架，即 10 个被发展中国家指定为特别重要的指标，以跟踪各国承诺的落实情况。

50. 釜山论坛上所作的提高援助可预测性的承诺在目标年 2013 年不太可能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捐助国削减了预算。⁵⁴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可预测性的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捐助者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支付的数额比 2010 年所计划的分别低 5% 和 8%。与 2009 年相比，情况明显恶化。⁵⁵ 捐助国须考虑新的机制，以增加援助资金的可预见性。

51. 南南合作已成为发展资金日益重要的补充来源。据估计，南南发展合作资金到 2010 年时已达到 129 亿至 148 亿美元，并预计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印度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均计划大幅度增加。⁵⁶ 大部分资源的形式是项目资金双边方案。这种形式的合作注重的是共同利益和伙伴关系，而不是同情心（紧急援助除外），并采纳更广泛的发展效益理念。南南发展合作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种综合的办法，将贸易、投资和贷款的商业交易与专项援助，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方案，捆绑在一起。扩大南南合作可能有助于缓解从传统捐助者所得援助收入的下降，但从不应被视为传统援助的替代。因为它是以商业贷款形式提供的，故债务可持续性不受影响也同样重要。

52. 国际援助体系仍缺乏一个普遍参与的全球相互问责机制。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于 2012 年 6 月，它是第四次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的一项成果。

⁵³ 经合组织：2011 年援助实效：执行《巴黎宣言》的进展情况（巴黎，2012 年）。

⁵⁴ 经合组织：“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nhancing the future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by all stakeholders” 发展援助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高级别会议，伦敦。

⁵⁵ 经合组织：“2012 DAC report on aid predictability: survey on donors' forward spending plans 2012-2015 and efforts since HLF-4”，2012 年 12 月。可查阅 oecd.org/dac/aid-architecture。

⁵⁶ 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工作队：新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可查阅 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untaskteam_undf/glob_dev_rep_2013.pdf。

它确定了一系列优先事项，包括发展合作与国内资源调动的互联，私营部门的参与和知识交流作为一种发展合作形式，并从 2014 年后期开始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在论坛的成果文件中，领导人还看到，联合国已有机制的重要补充作用，故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合作论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高级别论坛所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提供咨询。

53. 由于需要有更可靠的国际公共资金，故加强了寻找新的发展资金来源的努力，这既是为社会需要筹资，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也是为了利用私人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问题。据《201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估计，通过金融交易税和碳排放税和通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每年约可筹集 4 000 亿至 4 500 亿美元。这些创新机制是可预测地筹集大量资源的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并可能有助于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挑战；然而，执行起来在政治上很困难。特别是使用特别提款权，其面对的不仅是相当大的政治障碍，而且还有实际和法律方面的障碍。⁵⁷

54. 然而，重要的是，这种筹资应增加和补充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一个重要问题是，最终应如何就这些措施进行计量核算。例如，欧洲议会批准了在 11 个国家实施一项金融交易税。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列国发展部长最近呼吁将部分金融交易税收金用于发展和气候变化干预，但尚不清楚有多少国家将会参与以及该项税收的多大比例将用于全球合作。此外，这些税收还可能会被作为官方发展援助列入捐助方预算，并计入官方发展援助承付款，这样很难监测这项资金是否为现有援助的额外补充。越来越强调利用国际公共资金作为调动私人资金的手段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例如保障机制和其他机制的会计问题。

55. 即使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得到履行，要实行变革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光靠公共资源是不够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资金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率领国际资源调集努力，填补资金大缺口，并推动所需的投资、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为此目的，联合国正在开展一项政府间活动，目的是在 2014 年结束前编写一份关于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筹资战略报告。

五. 外债

56. 2012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占国内总产值比率平均为 24.5%，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比率为 45.9%，仅略高于 2011 年，⁵⁸ 按历史标准衡量仍然较低。然而，

⁵⁷ 基金组织：“Enhanc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tability—a role for the SDR?”。可查阅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10711.pdf。

⁵⁸ 所列全部比率和数据均依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3 年 4 月。

这一总体情况掩盖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严重负债的程度或面临的重大债务困扰风险。虽然许多低收入国家都已从包括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在内的全面债务减免方案中受益，但一些小国和低收入国家仍面临着主权债务的挑战。

57. 这个问题在加勒比国家中最为严重，其中一些国家本已虚弱的财政状况由于极端天气事件而雪上加霜。此外，由于与美国和欧洲的密切关联，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较高，贸易优惠受到侵蚀，这些国家还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许多小国不可能简单地“以增长摆脱债务”，而是可能需要通过额外的政策措施减少它们的债务负担。

58. 截至 2013 年 3 月，39 个重债穷国中的 35 个已达到“完成点”（债务全面减免在此点成为不可撤销）。2012 年和 2013 年，又有科摩罗、科特迪瓦和几内亚这三个国家在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下达到完成点。乍得是处于决策点和完成点之间中期阶段的唯一国家，而另外三个国家——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有资格获得债务减免。仍受严重债务困扰的津巴布韦也可被添至符合条件国家的列表中，前提是今后的债务评估确认它符合负债标准而且它的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得到恢复。

59. 不过，重债穷国增多的借贷，包括债券融资、非传统债权人贷款和优惠融资，正在占据新创建的借贷空间。例如，过去几年中，有 10 个非洲国家，其中包括 3 个低收入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了主权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81 亿美元。这种新债务的期限较短（11.2 年，相比之下平均期限为 28.7 年）而未偿外债票面利率较高（6.2%，相比之下平均票面利率仅为 1.6%），⁵⁹ 其中很多属于优惠。世界银行集团的分析显示，在八个国家中，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比率已达债务减免前的三分之一。尽管借贷增加，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各国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评估显示，在 90% 的低收入国家中，债务困扰的外部风险自 2009 年以来有所改善或保持了稳定。⁶⁰

60. 此外，发展中国家各类公共债务的构成一直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以当地货币计值的国内债务份额一直在增加，从而降低了一些国家的货币错配风险。与此同时，短期债务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国内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的转变，其中往往缺少较长期的债券市场。

61. 从正在进行的讨论中可清楚看出，为加强对外借款在促进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努力加强三大支柱：负责任的借贷、债务管理和主权债务重组框架。

62. 随着债权人和工具的范围扩大，实施精心设计和负责任的债务管理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以往主权债务危机的特点是债权人不太负责地以相对较低的

⁵⁹ H.Rashid and J.Stiglitz,“Sub-Saharan Africa’s subprime borrowers”。可查阅 project-syndicate.org。

⁶⁰ 基金组织，“审查基金所支持方案的债务限额政策”。可查阅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3/030113.pdf。

利率向底子薄弱的国家贷款。因此，债权人加强其信用筛选至关重要。只要改善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面申报系统为基础的主权债务数据的及时性和覆盖面，就可以促成更可靠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贸发会议正带头努力把这个问题列为讨论的优先事项，并在 2012 年制订了“提倡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⁶¹ 这些原则是预防危机的一件重要工具，因为它们规定了主权借款人和贷款人两方面的责任，倡导了缔结债务交易过程中的良好行为守则和体制设置。此外，20 国集团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继续就可持续借贷惯例开展工作。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63. 就不属于重债穷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言，债务重组进程缺少一个统一的解决纠纷机制、可执行的债权人优先规则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有组织代表。改革债务重组架构的工作一直进展缓慢，所采取的递增步骤不足以为债务危机提供一个及时和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⁶²

64. 在债券合同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是为了解决债务重组中的一些债权人协调问题。然而，集体行动条款并不能解决与主权债务重组有关的所有复杂问题，其中包括设立优先规则和确保债务国能够丢掉包袱重新恢复增长。特别是，集体行动条款只涉及到债券债务，却不涵盖一个国家的所有类别债权人。

65. 欧元区成员持续的债务危机加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债务问题可以构成系统性风险，而各方必须重新审视解决债务危机的架构。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维持现状会令所有各方都付出高昂代价，必须在新的融资、停滞不前、债务重组和调整方案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66.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贸发会议组织了一系列高级别小组讨论和专家组会议，讨论可能加强债务重组进程有效性的措施。会议报告既包括合约选项也包括法定选项，供进一步讨论。⁶³ 贸发会议目前正在协调一个由知名专家和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关于创建一个债务解决机制的国际工作组，对这一机制的各种选项进行审议。基金组织决定，在其理事会于 2013 年 5 月对题为“主权债务重组——最近动态和对基金法律及政策框架的影响”的报告进行讨论之后，审查其主权债务重组政策及惯例。⁶⁴

⁶¹ 可查阅 unctad.info/upload/Debt%20Portal/Principles%20drafts/SLB_Principles_English_Doha_22-04-2012.pdf。

⁶² 见 Udaibir S.Das, Michael G.Papaioannou and Christoph Trebesch,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s 1950-2010: literature survey, data and stylized facts”, 基金组织工作文件 (2012 年,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第 60-65 页。

⁶³ 小组讨论和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可查阅 un.org/esa/ffd/msc/externaldebt/index.htm 和 unctad.info/en/Debt-Portal。

⁶⁴ 可查阅 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3/pol052313a.htm。

67. 国际社会应更积极地致力于为解决主权债务制订一种商定方法/机制，以确保护法律可预见性和及时的债务重组，其中包括公平的责任分担。召集一个国际工作组研究加强债务重组国际架构的各种选项，也许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六. 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统筹性和一致性以支持发展

68. 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及架构，以改进其运作、稳定性和复原力。尽管有了这些努力，系统性的缺点依然存在。这些缺点与其他因素一道，削弱了国际社会调动和分配资源以资助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增强其统筹性和一致性，特别是在以下关键领域：(a) 金融及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b) 金融监管；(c) 多边监督；(d) 全球金融安全网；(e) 主权债务。

69. 全球危机及其后果既突显了全球金融和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暴露了其缺点。针对全球治理体制架构中的漏洞，20 国集团等特定国家组合已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论坛。20 国集团领导人已承诺解决金融体系中的短期弱点，并加强中长期的增长基础，以期保障全球金融稳定，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均衡和可持续增长。这些承诺于 2013 年 4 月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和于 2013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20 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都得到了重申。

70. 自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全球失衡的情况已经缩小，⁶⁵ 但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中的需求紧缩，而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失衡与外汇储备积累相互关联，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它们中有许多都把持有储备作为防范金融市场高度波动的一种自我保险形式。然而，储备积累过多是有代价的。大多数国家都持有美国国债和其他安全资产。因此，储备代表了一种不能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受制约储蓄形式。此外，尽管储备对单一国家而言或许可以发挥保险作用，从而降低风险，但总体来看，这些储备却加剧了全球失衡。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⁶⁶ 建议国际储备体系更多地利用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因为对于为了自我保险而积累国际储备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替代办法。

71. 现在显然需要一个进一步强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这就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增强其效力。联合国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多边论坛。在这方面，20 国集团必须继续加强、增进与联合国的互动协作并使之系统化。

⁶⁵ 《2013 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E/2013/70)。

⁶⁶ 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2009 年 9 月 21 日的报告。可查阅 un.org/ga/president/63/commission/financial_commission.shtml。

72. 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是使全球经济治理更具参与性和有效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朝着一个更具代表性、敏感度和责任感的治理结构迈出了重要步伐。更好地反映基金组织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相对权重变化的 2010 年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在批准进程方面已取得进展。使改革措施生效的三个门槛中的两个现已迈过。至于剩下的一个条件，截至 2013 年 7 月 10 日，140 个成员，即总投票权的 76% 左右，已同意批准修改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但未达到所需要的 85%。⁶⁷ 此外，基金的执行董事会承诺达成一项新的配额公式，作为其不迟于 2014 年 1 月就第 15 次份额总审查开展工作的一部分。

73.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缺点。作为对策，有关方面已采取步骤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主要目的是通过《巴塞尔协议三》框架确保以银行部门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其他措施包括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解决被认为“规模大到不能倒闭”的具系统重要性机构造成的问题，并改革市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不过，有人担心更严格的监管和框架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新一波的监管套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可能会在为其金融系统实施法规、监测这些法规执行情况 and 解决潜在意外后果的能力方面遇到严重困难。⁶⁸ 具有广泛基础的简单法规，如高资本率和低杠杆率，加上简单的反周期规则，管理起来将比较容易且成本较低。⁴² 此外，对运作良好金融部门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及增长以及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面，重视程度也不够。⁶⁹

74. 近年来，查明金融和经济稳定所面临风险的多边监督在质量和覆盖两方面都得到了加强。2013 年 1 月，基金组织实施了综合监督决定，以加强监督的法律框架。更重要的是，综合监督决定有利于对溢出效应，包括成员国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各种溢出效应，进行更加综合及一致的分析。这种分析通过新颖的溢出和外部部门报告进行，从而把基金组织的外部稳定性评估扩大到了汇率之外，包括了对外部资产负债表、资本流动和国际储备政策的评估。基金组织还对金融部门所产生风险对全球稳定的影响给予了更大重视。一个新的金融监督战略为制订一个统一的宏观金融框架奠定了基础，这一框架将考虑到金融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中期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联及互动。

⁶⁷ 基金组织“接受就改革执行董事会对协定条款的拟议修正并同意 2010 年的份额增加”。可查阅 imf.org/external/np/sec/misc/consents.htm。

⁶⁸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reforms o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a review of potential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report to the meeting of Group of 20 Ministers of Finance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June 2013.

⁶⁹ Joseph E. Stiglitz, “Principles of regulation”, presentation at the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Financial Markets Reform Task Force Meeting,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July 2006. 可查阅 http://policydialogue.org/events/meetings/financial_markets_reform_task_force_meeting_manchester_2006/materials。

75. 在金融持续不稳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安全网已大幅度加强；不过，努力填补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漏洞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基金组织已加强了其预防危机的工具，在审慎提供大量前期融资的贷款框架中引入了新的灵活性，同时增加了贷款机会并简化了借贷条款。自危机开始以来，它已向其成员国承诺提供贷款超过 3 000 亿美元。⁷⁰ 此外，区域和双边构成部分对全球金融安全网予以补充。得益于借贷双方间密切关系，区域金融协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稳定机制于 2012 年 10 月设立，最高贷款能力为 5 000 亿欧元。截至 2013 年 4 月，欧洲稳定机制核准了在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两项重要财政援助融资机制协议方案。然而，金融体系仍缺乏一个可在系统性清偿能力危机之际确保迅速动用足够资源稳定市场条件的全球机制。

七. 保持互动协作

76. 2013 年 4 月 22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了其高级别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总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筹资中的一致性、协调与合作和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在理事会主席和常务副秘书长致开幕辞后，上午的部长高级别小组会议讨论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下午的会议由非正式专题辩论组成，主题是：(a)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后续行动的背景下为可持续发展筹资，包括为此利用私人资本；(b)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会议成果载于理事会主席的总结(见 A/68/78-E/2013/66)。

77. 依照大会第 67/198 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主题是“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从债务危机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和正在主权债务重组及债务解决机制方面开展的工作”。在经社理事会主席、贸发会议秘书长和主管经济发展事务助理秘书长致开幕辞后，世界银行、贸发会议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高级工作人员主持了对这次会议主题的讨论。在下午的会议上，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教授发表了题为“债务重组法律及体制架构中的漏洞”的主题演讲，然后进行了小组讨论。更多信息可查阅 un.org/esa/ffd。

78. 大会在其第 67/559 号决定中，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的要求，设立了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区域集团提名的 30 位专家组成，其任务是不迟于 2014 年编写一份报告，提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备选方案，推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调集并有效利用资源。它将利用联合国系统的技术支持并与相关国际及区域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公

⁷⁰ 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可查阅 imf.org/external/np/exr/facts/changing.htm。

开和广泛的协商。为酌情就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信息，专门设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工作组，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协调。该委员会实务秘书处设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推动与其他相关政府间进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发展筹资进程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制订进程，开展协调。
